

「盡可能的微力， 作些澆花的工作」

讀楊雲萍〈近事雜記〉

◆黃英哲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

晚近，部分台灣年輕世代的台灣研究學子，高唱台灣文學與台灣史研究要去中國脈絡，不想用心去研讀理解中國文史，楊雲萍那一代的台灣本土學人沒有所謂去中國脈絡的問題，但卻絲毫不影響其觀看台灣的位置。

1947年9月，時年42歲的詩人、小說家與南明史、台灣史學者楊雲萍，在《台灣文化》（2卷7期，1947.10）連載的專欄〈近事雜記（八）〉寫下：

魯迅云：「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裡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才放了心。」（〈馬上支日記〉，《雨絲》第八十七期所載。按：此篇後收在《華蓋集》續篇，今據《雨絲》引）

現在，我們因知道「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而我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所以在可能的時候，在可能的機會，盡了可能的微力，做了一些「澆花」的工作。可是，世上一部分的「聰明」而又勇敢的「批評家」們疑為我們沒有「遵照田媽的學說」，就大肆其「批評」和「嘲罵」；但是，他們自己卻未曾想到要「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而且他們又似是「沒有一定澆花的時候」！

楊雲萍刊登於《台灣文化》（1946.9～1950.12，台灣文化協進會）的專欄〈近事雜記〉，從1946年12月連載到1949年3月，共19回，留下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發揮了作為



楊雲萍（1906～2000），原名友濂。1925年與友人江夢筆合辦第一本台灣白話文文學雜誌《人人》。1926年赴日留學，研究文學。1932年返台，投入南明史、台灣史的研究，為文史雙棲的學者。

一位文學家與史學家的功能。楊雲萍的系列專欄「近事雜記」，跨越「二二八事件」前後，在〈近事雜記〉中有很多蘊藏深意的時代狀況觀察，以及對當時台灣研究的感想。在上述〈近事雜記（八）〉，楊雲萍引用魯迅1926年發表的〈馬上支日記〉中「七月一日」中的一段，而〈馬上支日記〉中「七月一日」的另一段，魯迅又寫下：「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贊成槍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名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麼？所以三一八慘案，即等於以赤討赤，無論哪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所謂的「三一八慘案」即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學生為了抗議北洋政府段祺瑞屈服日本侵犯中國主權的要求，在天安門集會抗議，北洋政府除了開槍掃射之外，還以大刀、鐵棍砍殺抗議學生，學生

有47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位受傷。為此，魯迅寫下〈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紀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雜文與〈馬上支日記〉表達他的憤怒。尤其在〈無花的薔薇之二〉，魯迅悲憤地寫道：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楊雲萍的〈近事雜記（八）〉引用了魯迅的〈馬上支日記〉，他的真正用意是想借用〈馬上支日記〉中提及的「三一八慘案」中國北洋政府虐殺學生之事，批評國民政府在



〈近事雜記（八）〉執筆同一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之虐殺，國民政府的所為與北洋政府相差無幾，這正是楊雲萍的一種時局下的曲筆手法，特別文章中所謂的「澆花論」，更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借用了魯迅在1926年談北洋政府鎮壓民主與學生的往事以對照當下。但是，因「二二八事件」而被千夫所指萬眾非議的陳儀，楊雲萍在事件之後的12月寫下的〈近事雜記（十一）〉（《台灣文化》3卷1期，1948.1），卻非常有勇氣地說道：

陳公洽（儀）氏的治台，因為二·二八事件，已經被認定做「失敗」了。對此認定，我也是表同意的，不過，因他的「失敗」，而懷疑他的主觀的「意欲」或人格的某種非難，我是不敢遽爾苛從的。（略）他是有一個「理想」，有一個「抱負」的政治家，而在主觀上要努力使理想實現，這是事實。不消說，一個人的主觀的意欲，有時是要有錯誤的，有時是反要阻礙客觀的進步，但是，在此沒有「理想」，不想努力的所謂「政治

家」這麼多的一群裡面，有些「理想」的，想要努力的不是已經值得我們原諒嗎？

從楊雲萍對陳儀的辯解之詞，再對照五十年後郭松棻的小說〈今夜星光燦爛〉，不禁要為被歷史撥弄的陳儀發出長嘆。

上述的「澆花論」，楊雲萍又暗示著立志要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努力延續中斷的台灣研究工作（澆花＝延續被中斷的台灣研究）。作為台灣史研究的學者，楊雲萍在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扮演了重要角色。戰後初期，他協助大陸來台學者、教育家許壽裳籌畫台灣省編譯館（1946.8～1947.5）台灣研究組的成立與運作，楊雲萍擔任了該組的主任，台灣省編譯館是二戰後中國或是二戰後台灣的制度化之官方台灣研究機構之濫觴，編譯館從成立到撤廢時間雖然短暫，在極其短暫的全盛時期，曾網羅了鄭桓、梁嘉彬、張常惺、廉新生、張樑標、賴子清、國分直一、池田敏雄、淺井惠倫等中、台、日三地台灣研究相關學者，共同為整理保存戰前台灣的台灣研究而努力，延續戰前與戰後台灣研究的「人的」與「知識生產的」連續性。

「二二八事件」標誌了台灣省編譯館的終焉，隨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改組，編譯館也被裁撤了。1947年6月楊雲萍在〈近事雜記（五）〉（《台灣文化》2卷4期，1947.7）悲觀地記下「老實說，昨今談起台灣的歷史的研究，我有些害怕，因為從一部分的人看，這些研究，確屬無『用』。」7月執筆的〈近事雜記（六）〉（《台灣文化》2卷5期，1947.8）無奈地記下「省編譯館已被撤銷，此乃當局的方針，曾在館裡服務的我個人，雖有些感慨，可是，不想說什麼，何況『撤後是非誰管得』！」

同年八月，在許壽裳的推薦斡旋下，楊雲萍轉任台大歷史系教授，並隨即開授「台灣史」課程，是戰後第一位在大學高等學府開授「台灣史」課程的學者，在前面介紹的〈近事雜記（八）〉，楊雲萍其實即已表達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澆花」（澆花＝延續被中斷的台灣研究）精神，在〈近事雜記（八）〉的結論裡，他得意地自道「台灣大學文學院當局，新決定『台灣史』為文學院史學系第二學年以上的必修科目。這因和我個人有些關係，所以未便說恭維的話；可是平心而論，這決定是值得世人的注目的。C院長（筆者按：係當時文學院長錢歌川）說：假使畢業本學院的史學系的，而不知道台灣的歷史，豈有是理。這話是說得非常痛切。台灣是要研究的，當然不只在它的歷史而已。但是我們要站在『學』的立場，用『學』的方法而研究；不可因『好奇』，或是『趣味』，甚至因某種的『作用』而研究。」

台大文學院史學系將「台灣史」訂為必修科目，是否與楊雲萍有關，無從考證，但是可以確認的是當時大陸來台學者並不排斥在大學設置「台灣史」科目，楊雲萍直到1977年退休為止，在台大歷史系一直擔任「台灣史」科目，努力「澆花」，為台灣培養不少台灣史研究人才（例如中央研究院現台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同研究所已退休研究員黃富三、陳秋坤、前國史館故館長張炎憲、前國史館館長林滿紅、成功大學歷史系故教授林瑞明，皆是其台大歷史研究所指導的學生），同時致力「台灣史」的研究工作，使之脫離「趣味」、「好奇」、「為政治服務」的層次，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接續戰前，同時也接續戰後的台灣史研究。

自去年開始一直思索著，如何從台灣位置重新審視「五四」這個歷史關鍵，因此重新思索活躍於戰前和戰後台灣文化界的台灣本土文化人之同時代言

動，以及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相關論述。其中楊雲萍也是我注目的對象之一，最近又細讀了其發表於戰後初期的〈近事雜記〉，重新認識到楊雲萍極為熟悉魯迅、中國新舊文學、中國歷史，善用曲筆表達在時代轉折點上的觀察、關懷與志向。晚近，部分台灣年輕世代的台灣研究學子，高唱台灣文學與台灣史研究要去中國脈絡，不想用心去研讀理解中國文史，楊雲萍那一代的台灣本土學人沒有所謂去中國脈絡的問題，但卻絲毫不影響其觀看台灣的位置。時至今日，再度閱讀這些前輩的文章，重新思索了當前的台灣論述不禁有感，特記於「百草言」。

2019.6.10



1946年12月～1949年3月，楊雲萍於《台灣文化》連載〈近事雜記〉專欄。（黃英哲提供）